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丰子恺散文的苦闷情结

科目编号: UASZ 3068

学生姓名: 甯敬乔

学位名称: 文学士 (荣誉) 学位

指导老师: 潘筱蓓博士

呈交日期: 21/04/2014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 (中文) 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ii
宣誓	iv
摘要	v
致谢	vi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研究方法、范围、难题	4
第三节 文献综述	5
第二章 丰子恺苦闷思想与创作成因	
第一节 生平主要事迹	6
第二节 苦闷思想与创作成因	9
第三章 丰子恺苦闷思想论	
第一节 两种力——苦闷的根源	10
第二节 人间苦与文艺	13

第四章	丰子恺散文的苦闷情结内容	
第一节	童心泯灭的苦闷情结内容	15
第二节	人生无常的苦闷情结内容	19
第三节	虚伪人事的苦闷情结内容	22
第五章	结论	24
参考书目		26

丰子恺散文的苦闷情结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9UJB01147

日期：21/04/2014

摘要

五四时期的苦闷书写是盛极一时的。丰子恺作为五四时期背景下的知识分子与文学家，苦闷思想对他的冲击亦是首当其冲的。许多学者多从儿童题材与宗教情怀对其作品进行剖析，却忽略了其创作的原始动力，即其内心极大的苦闷。丰子恺认为，这世间是狭隘且令人窒息的，因此其自由的奔放的感情要求无法被满足，继而从文艺排解其苦闷，以求生的欢喜。因此本文从其散文作品探讨其苦闷的根源和情结。

本论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交待研究动机、研究方法、研究难题、研究范围、以及文献综述。第二章“丰子恺苦闷思想与创作成因”，论述的是促成丰子恺的苦闷思想的人生经历。第三章“丰子恺苦闷思想论”，论述的是厨川白村与丰子恺对“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思想观点，从中得出他们对苦闷根源的诠释，以及文艺与苦闷的关系。第四章“丰子恺散文的苦闷情结内容”，是较为深入地探讨丰子恺的苦闷思想，从其散文一一剖析个中苦闷根源与内容。第五章结论。

关键词：丰子恺；苦闷的象征；散文；

致谢

六年寒窗，我常自嘲说可以当医生了。六年不长也不短，然而其中辛酸回忆起来还真是一大把。起初一路无阻，行得甚为通畅。然而转了工作之后，路可变崎岖了、坎坷了，路途荆棘满满，不过我还是走到了这里。

这半工读的岁月里，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身边的人是不能感受你所感受的，但能在一路上陪着你感受。有了家人递上的热汤和凉茶；友人送上的问候和鞭策；老师给予的宽容和机会，就算杯子里的水冷冰冰、滚烫烫，我想，也冻不了烫不伤我。这些人，我感恩，我珍惜。

我知道这份论文是毕业的关卡，但一定不会阻碍我继续学习的终点站。我享受学习，更深深相信，人是有无限潜能的。

第一章 绪论

“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的是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梦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以及在异国他乡作为弱国子民遭受歧视的苦闷等等。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似乎就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艺术理论总结。（余连祥，2005：1）丰子恺曾和鲁迅同步着手翻译《苦闷的象征》，由此可见这部文艺论著的可观性。从这也可看出当时身为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文学家之一的丰子恺，对厨川白村所提出的文艺与苦闷思想的关系之认同。

在《读《读缘缘堂随笔》》一文中，丰子恺亦这么写道：“已逝世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君曾经说过：文艺是苦闷的象征。文艺好比做梦，现实上的苦闷可在梦境中发泄。这话如果对的，那么我的文章，正是我的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丰一吟，2000：259）丰子恺自认他的二重人格一方面为虚伪的、冷酷的、实利的成人，另一方面则为天真的、热情的、好奇的、不通世故的孩子。两者间的矛盾是丰子恺精神上的苦痛。从以上引文中，又一次证实丰子恺对厨川白村所提出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之观点是认同的。而丰子恺亦称自己的文章是其二重人格的苦闷的象征。换言之，要从丰子恺的文章找出其人生苦闷的根源与内容是有迹可寻的。故此本文欲从丰子恺的散文着手探讨其人生苦闷的根源与其苦闷情结的内容。

第一节 研究动机

认识丰子恺，是从他的画开始。那是一幅名为《开棺》的画，图意为将罐头肉品比喻成一具具的动物棺材，而人们在罐头肉品上桌前，得先有“开棺”动作。这幅画当下震撼了我，并且令我至今仍然印象深刻，原因在于丰子恺看世事的角度以及他对动物的同理心。后来发现，原来这名画家也有散文作品。起初读了他的《渐》，文中对时间渐进推移且不可挽留的描写，突出了作者的时间观感，句句深入吾心，这无疑又对他更加欣赏更为关注了。

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为丰子恺散文集《缘缘堂随笔》译成日文，译者在序言中写道：

“我觉得，著者丰子恺，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这并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的缘故，我所喜欢的，乃是他的像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的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骨。如果在现代要想找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是他了吧！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丰一吟，2000：261）

作家赵景深亦曾谈及丰子恺，他写道：

“他只是平易的学者，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转引自钟桂松，2003：55）

丰子恺的性情和散文，一批同时代的大家都曾给予高度评价。（详见钟桂松，2003：55-56）而这些肯定的评价不外乎自然、质朴、率真，能得如是评价，是因为丰子恺的散文乃其性情与生活相结合的产物。（钟桂松，2003：56）故此，要从他的散文发现其思想形成与情感动向，应是有把握的事。

丰子恺散文的主题就其人生经历而有所转变，然而对儿童的关怀、对众生的悲悯情怀、对无常和真我所作的思考、对艺术生活的重视与提倡，无疑的还是其散文的主轴。历来对丰子恺散文的探讨，亦大都集中于儿童、宗教等创作素材的强调。（石晓枫，2007：99）而笔者读丰子恺的散文，最有共鸣的则是一种无奈和困惑之感。无奈和困惑之感源自于对时间和空间的无可把握、对生命无常的定律、对儿童长成大人必经的社会洗礼、以及对社会人事的虚伪。故此笔者欲以最具共鸣的部分作为研究范围，为深入理解，甚至解惑。

后来又发现，丰子恺曾留学日本，因而通日文并成了翻译家，而丰子恺最早出版的译著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¹“苦闷说”因而成了丰子恺重要的美学思想之一。而这一“苦闷说”思想，似能诠释笔者从丰子恺作品读出的无奈与困惑之感，加之笔者未能搜获从苦闷思想探讨丰子恺散文作品的研究，因此认为探讨丰子恺散文作品的苦闷情结，乃有其研究价值。

¹ “丰子恺最早出版的译著是 1925 年 3 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论著《苦闷的象征》。”（余连祥，2005：1）

第二节 研究方法、范围、难题

本文研究方法主要为文本分析。研究范围是丰子恺早期散文。根据石晓枫对丰子恺散文创作的分期，第一期（1926-1937）为丰氏思想的定型与开展阶段，为时十一年；第二期（1937-1949）乃丰氏人生遭逢第一转折的抗战期及其后数年，为时十二年；第三期（1949-1966）为丰氏人生遭逢第二转折的大陆沦陷后十七年期间；第四期（1966-1973）则为丰氏人生遭逢第三转折的文革期，为时九年。（石晓枫，2007：80-81）根据以上所述分期，本文所谓的早期散文即是指第一期的散文创作。石晓枫指出，在抗战期间，大部分作家的思考重心，显著地集中于现实的政治问题上。（石晓枫，2007：83）笔者认同此观点，并且根据丰子恺散文的创作题材，第一期即早期的散文创作较为符合本文探讨的主题，因为他的早期散文创作题材多为：儿童、人生无常、虚伪的人事社会。而本文所探讨的苦闷思想将以个人所感为主，不牵涉现实的政治问题所引发的不满或励志作品为讨论重点。故此本文的研究范围将锁定丰子恺的早期散文，以探讨其苦闷情结的内容。

研究难题是丰子恺所译《苦闷的象征》一书因为政治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后已遮蔽起来。（余连祥，2005：1-2）而后只能看到鲁迅翻译的版本，因此也只能从鲁迅译本着手了解厨川白村的思想观点，这样便出现了间接了解的情况。再者，丰子恺的美学思想无一理论系统，并没有相关美学著作，只能就其散文着手探析关于他的苦闷思想，概念较为零碎，需花较长时间整合概念。另外，丰子恺的散文作品亦没有编成一部总文集，散文作品可说是零散分布。

第三节 文献综述

本文所引的散文底本为丰一吟选编的《丰子恺散文》，另以丰子恺著，丰陈宝、杨子耘编的《丰子恺随笔精粹》还有杨牧所编的《丰子恺文选》作为参考与核对。至于丰子恺的生平经历则参考自挪威作家何莫邪著而张斌译的《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钟桂松的《人物聚焦丛书·丰子恺》、以及石晓枫的《白马湖畔的辉光——丰子恺散文研究》。丰子恺的散文创作分期亦是从小石晓枫的《白马湖畔的辉光——丰子恺散文研究》参考得来。丰子恺的苦闷思想论述则以余连祥的《丰子恺的审美世界》作为参考。厨川白村著而鲁迅译的《苦闷的象征》是探讨“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之观点的重要参考书籍。

另外，笔者亦参考了相关学术论文与期刊论文。例如薛雅明的《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与厨川白村文艺观之比较》、薛雅明的《丰子恺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比较研究》，是研究丰子恺与厨川白村的苦闷思想的重要文献。另外，赵晓燕的《丰子恺散文论》、余连祥〈绝缘·苦闷·情趣——丰子恺美学思想的特征〉、孙希娟〈丰子恺散文创作简论〉，还有郝江波、赵蕾〈出世情怀入世心——丰子恺早期散文创作中的现实关注〉，都是研究丰子恺散文创作的重要参考文献。

第二章 丰子恺苦闷思想与创作成因

本章将从丰子恺的生平经历探讨其苦闷思想的成因，以及其以苦闷为创作动力的成因。丰子恺童年时的情感记忆、青少年时的文化教育、以及中年时的人生际遇，都是与其苦闷思想的形成与创作心态有着密切联系的。其中青少年时期受师长与同侪的影响，又尤为值得关注。因此，对丰子恺生平主要事迹的了解，乃是为了发见其苦闷思想成因以及创作成因，以更好地探讨丰子恺的苦闷思想与散文中的苦闷情结。

第一节 生平主要事迹

丰子恺于一八九八年出生在浙江崇德县石门湾。原名丰润，小名慈玉，这是因为父亲把他视为掌上之玉而取的。上小学时，老师担心“润”字太难写而对他日后的选举不利，故为之改名为丰仁。十七岁时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老师单不厂与之投缘，根据“仁”字，为之取字“子颢”，“颢”与“恺”通，后来便一直沿用“丰子恺”一名了。

丰家世代经营染坊，百年老店叫“丰同裕染坊”；可是传到清末已经衰落了。丰子恺的父亲丰镛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及第的举人（庚子辛丑恩政併科第八十七名），辛丑之后，科举废除，仕途也随之断绝。然而丰镛并不善经营染坊店中事，因此只得在家设塾授徒。丰子恺幼年读书，乃由他父亲启蒙亲授。（杨牧，1982：一）不过后因肺病，在丰子恺九岁时便逝世了。母亲钟芸芳身兼严父慈母，扛下了丰子恺一家重担。故丰子恺与母亲感情深厚。

丰子恺早在童年时期已是个多愁善感、敏于思索生命本质问题的孩子。比如有一次坐船回乡扫墓之际，手中的不倒翁失足翻落河中，他会对其下落与命运起了疑惑与悲哀。又有一次与小学校里的同学赴郊外散步，将树枝抛弃田间之际，会依依不舍和不停地回顾，为其结果和后事于心中充塞着悲哀与疑惑。而这种特质在成年后并未稍减，反而日益深刻。（丰一吟，2000：15-19）因为他在长大之时所经历的无常是更加深刻的。比如在1930年春母亲钟芸芳的辞世，是丰子恺人生中经历最深刻的锤打和考验。丧母之痛使丰子恺堕入颓唐状态，数年内心中都充满对无常的悲愤与疑惑。（丰一吟，2000：55-58）

丰子恺在青少年时期遇见对他影响至深的师长与同侪的经历，尤其值得关注。他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结识了深思又特立独行的同学杨伯豪。据丰子恺所述，杨伯豪是个头脑清楚、个性强明的少年。丰子恺曾自述：“我那时候真不过是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学生，胸中了一无一点志向，眼前没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袭与传统的一个忠仆，在学校中犹之一架随人运转的用功的机器。”（丰一吟，2000：34）后来是杨伯豪启迪了他并激发了他个性中潜藏的反叛特质。（石晓枫，2007：15-16）丰子恺的思想观念受伯豪影响至深，可见于在伯豪因故辍学时，丰子恺有此想法：“我少了一个私淑的同学，虽然仍旧战战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惧而服从的日月，然而一种对于学校的反感，对于同学的嫌恶，和对于学生生活的厌倦，在我胸中日渐堆积起来了。”（丰一吟，2000：40）

在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丰子恺从李叔同（即弘一法师）学习绘画和音乐，对他影响至深。² 除此之外，李叔同后来出家归命于佛法，对丰子恺来说亦是另一极大影响。³ 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里，丰子恺表明李叔同是他生平最崇拜的人。除了在艺术才智和佛学上启发了他，还有另一个重点就是李叔同在人格陶养方面对他的影响。他在〈我与弘一法师〉一文里就提到，李叔同先生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个个学生真心怕他，真心学习他，真心崇拜他。丰子恺更借了夏丏尊老师的话来总结：“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李叔同的“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也因而对丰子恺的艺术创作影响深远。

另一位对他有较大影响的老师则是夏丏尊。夏丏尊在国文教学方面，积极提倡新文学，有着“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的严格作文要求，对丰子恺亦是影响深远，以致后来他写文章都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

（丰子恺，2004：157）丰子恺还表明，他的文章，是在夏丏尊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丰子恺，2004：157）

以上所述，即能见两位老师的赏识，确定了丰子恺对于艺术和文学的信心，并且能有一番成就。

² “我在师范学校，一二年级都考第一名；三年级以后忽然降到第二十名，因为我旷废了许多师范生的功课，而专心于李先生所喜的文学艺术，一直到毕业。毕业后我无力升大学，借了些钱到日本去游玩，没有进学校，看了许多画展，听了许多音乐会，买了许多文艺书，一年后回国，一方面当教师，一方面埋头自习，一直自习到现在，对李先生的艺术还是恋恋不舍。”（丰子恺，2004：189。）

³ “一九二七年，丰子恺在行年三十之际，因深感世相无常，遂请弘一法师为其举行皈依仪式，并取法名‘婴行’。”（石晓枫，2007：23）

第二节 苦闷思想与创作成因

苦闷思想的根基，在于人撇除了奴隶性，还有盲目服从于因袭、传统。丰子恺在青少年时期认识伯豪，并被她启迪与激发反叛特质的经历，是其苦闷思想成因的关键。当然丰子恺本身要有如是特质才能被激发，他的童年之多愁善感与敏于思索，就是其苦闷思想成因的重要基础。另外，在现实生活中遭逢死别之苦的生活体感，都是作家苦闷思想成因的重要因素。此外，丰子恺所接受的佛家思想，亦是苦闷思想的重要成因之一。丰子恺本着多愁善感与艺术家细腻的心思，对于佛家的“苦海无边”不免感到困惑苦闷。丰子恺独有的人生经历，与他的苦闷思想的成因密不可分。

笔者于本文将丰子恺早期散文创作的题材归纳为：儿童、人生的无常、以及虚伪的人事社会。这些创作的题材，当然与作家的人生经历脱离不了关系。丰子恺散文作品中之所以有人生无常的题材，是因为他经历了生离死别而生了苦闷。而虚伪人事的题材，则是与其反叛特质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不盲从因袭、传统的人，才可以发现人事社会的不合逻辑和不符合人性之处，继而生了苦闷。至于儿童的题材，丰子恺藉着赞美儿童而批判大人社会，是他本着佛家的情怀，还有对人性的关怀而生的苦闷。丰子恺在青少年时期对文学和艺术所确立的信心，使他所经历的人生苦闷得以通过文学创作来排解。

第三章 丰子恺苦闷思想论

纵观上章所述，丰子恺的早期创作蕴含着苦闷思想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然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这一观点是日本的文艺批评家厨川白村所提出的，因此在探讨丰子恺的苦闷思想之际，不可忽略厨川氏的观点对丰子恺的影响。本章分两节论述即“两种力——苦闷的根源”与“人间苦与文艺”，以此核实丰子恺是否全盘接受厨川氏的观点，而若答案是否定的，则欲探讨丰子恺与厨川白村的苦闷思想的异同之处，以于下一章更好地诠释丰子恺散文中的苦闷情结。

此章第一节“两种力——苦闷的根源”，论述的是厨川白村与丰子恺对人生苦闷根源的思想观点。第二节“人间苦与文艺”，论述的则是厨川白村与丰子恺所诠释的苦闷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第一节 两种力——苦闷的根源

厨川白村认为生活中有强大的两种力的冲突，因此产生了苦闷懊恼，继而有了文艺创作。而这两种力分别为“创造生活的欲求”的“生命力”，以及与之相对的“强制压抑之力”。根据厨川白村的诠释，“创造生活的欲求”的“生命力”是永不凝固和停滞的，总是在心底深处熊熊燃烧着。生命力避去妥协和降服，只寻求着自由和解放。生命力的表现，即个性的表现，是人类深切

渴求的，是人类活着的特征。因为假若人的个性无法发挥，则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生活无法创造，文化生活亦不成立。因此生命力若得以表现，即可获得“生的欢喜”。

人间生活的根本是人有着突进不息的生命力，然而人类生活在社会体制中，有制度、法律、军备、警察之类的压制，亦有资本主义和机械万能主义的压迫。人面对这从外面逼来的要求，即强制和压抑之下，很多时候“只好必然地服从那强大的体制”。因此，“在内在有想要动弹的个性表现的欲望，而和这正相对，在外却有社会生活的束缚和强制不绝地迫压着。”这就是厨川白村所谓的两种力，而这两种力的冲突之下，便生苦闷懊恼挣扎，而这就是人类生活，这就是苦闷的根源。然而厨川白村认为，这强制压抑之力，又不仅仅从外部而至，其实人类自身已经存在着矛盾。比如说，既有要以个人而生活的欲望，又渴望着群体生活；既有本能生命的欲求，又有道德的冲突而抑制管束自己的要求；既有兽性恶魔性的一面，又有着神性的一面；既是利己主义，又是爱他主义。换言之，人类即使不被外来的法则和因袭所束缚，也会自我产生冲突和纠葛。这亦是人生苦闷根源之一。总的来说，厨川白村认为“突进不息的生命力”与“强制压抑之力”（不管是外部而至或自身而有）的冲突，即产生苦闷。

厨川白村的“生命力”，丰子恺与之相对应的观点是“人的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而“强制压抑之力”，则被置换为“如此狭隘而使人窒息的”“世界”。丰子恺认为，人类本着原有的广大自由的心灵，有着满腹自由的要

求，感情是自由的奔放的，是怒放的炽盛的。然而现实世间是狭隘且使人窒息的，并不能应付人类那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这些要求在世间变为种种的不可能。人类随着岁月流逝，长大成人之际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状况，原有的广大自由的心灵，只能一再压抑，怒放的感情屡被磨折，最后变成驯服的人。即便如此，“这种感情的根，依旧深深地伏在做大人后的我们的心灵中”。这是丰子恺所呈现的人世间的冲突，还有人生苦闷的根源。余连祥说，在厨川白村那里，“生命力”和“社会力”是历史性的概念，具有时代性。（余连祥，2005：25）对此，薛雅明亦指出，厨川白村对“苦闷”的阐释从个人内部的冲突扩伸为人与社会外界生活的冲突，因而使得他的“苦闷”具有高度的社会性与时代性。（薛雅明，2013：96）丰子恺抽去了时代性，加以普泛化了。（余连祥，2005：25）一经对比，笔者甚为认同两位学者的观点。这在笔者看来，是因为丰子恺的佛家情怀，还有对普罗大众的人性关怀的特质，造就了与厨川白村的观点有差异之处。

另外，根据以上的分析，丰子恺所表达的苦闷的根源是较为笼统的，尤其“社会力”的部分，只知他所认为的世间是狭隘的且令人窒息的，至于具体的与“人类自由的奔放的感情的要求”相抵触的情况，则须留待第四章加以论述。

第二节 人间苦与文艺

上一节所论述的两种力的冲突和纠葛，在厨川白村看来，是古往今来所有的人们都曾经验的苦痛。他表示，纵使因了时代的大势，社会的组织，以及个人的性情，境遇的差异等，要有些大小强弱之差，然而几乎没有一个不为这苦痛所恼的人们。这又被称为“人间苦”。对于人间苦，人们总想脱离这苦境。对此，厨川白村认为，文艺“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的世界”。这样的概念是借了精神病学教授弗罗特的精神分析学加以印证的。由此可为厨川白村的文艺观作总结为，苦闷是文艺创作的动力，文艺创作是苦闷的象征。

丰子恺对艺术创作的观点，与厨川白村的文艺观相呼应。丰子恺认为，在承受“人间苦”的人们，只要不是“尽失其心灵的奴隶根性的”，就“一定谁都怀着这生的苦闷”。而人们要发泄要解脱，“以求一次人生的畅快，即‘生的欢喜’”，则需要艺术。丰子恺认为，现实让人们的身體被束缚，并且使人匍匐在地上。生活里若有艺术，则可以暂时放下一切压迫与负担，解除平日处世的苦心，而作真的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奔放的生命，从而发现生的意义与价值。（丰子恺，2005：1）

根据以上所述，对于人间苦与文艺创作的关系，丰子恺与厨川白村的观点有前呼后应之处。然而厨川白村借弗罗特的精神分析学说所论证的“文艺的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之文艺观，则是丰子恺所没有提倡的。厨川白村的

“广义的象征主义”，是指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苦闷思想内容，经过具象化的人物、事件、风景之类的表现出来，即称为象征——苦闷的象征。而丰子恺在这一观点上则没有多作诠释与提倡，他的散文创作之中，苦闷的思想内容与情感表现并没有过多的包装。

第四章 丰子恺散文的苦闷情结内容

纵观上章所述，丰子恺说，人间的苦闷是人都会怀着的，还有谁都不能去否定的人生经验，那么也就能下定论为丰子恺也是怀着人生的苦闷。因此本章欲从丰子恺的散文作品探讨作者的苦闷情结。究竟是怎么样的世界让他感到狭隘而使人窒息？究竟是什么样的感情要求让他觉得不能被应付？什么让他压抑？而他广大自由的心灵还有奔放自由的感情的内容又是什么？

纵观他的散文作品，可以从他书写的题材归纳其人生苦闷的内容。而他书写众多的题材是关于儿童，儿童在他的笔下是充满生命力的存在，作者往往在赞扬儿童的同时，提出对大人世界的厌恶批判，这是丰子恺人生苦闷的来源之一。另外，丰子恺也于文章中提出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和疑惑，对于人生无常的无奈，亦是他人人生苦闷的来源。除了通过赞扬儿童而批判大人世界，他也常有对虚伪人事社会表达不满的散文作品，因此人事社会的虚伪是另一个人生苦闷的来源。通过文章所表达的苦闷内容，其心灵所向往的广大自由和其奔放自由感情的内容亦能可见一斑。

第一节 童心泯灭的苦闷情结内容

对于儿童，丰子恺在《儿女》里以两件事带出他们的生活是天真、健全、活跃的。第一件事是吃西瓜。孩子们在炎夏里吃西瓜，顿感畅快之时，表现了生的欢喜。

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 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丰一吟，2000：27）

从孩子们吃西瓜的态度，即全部精神没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丰子恺认为他们的心眼是明慧的、是天地间最健全的。而在赞扬儿童为最健全者的同时，批判大人“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而能带出儿童是健全者的第二件事是，当孩子们爬到作者案上捣乱摆放物品的秩序时，作者起初的不耐烦、哼喝、夺脱孩子手里的物品、批孩子的小颊，顿时转为后悔，并自悟其非。他觉悟大人们有秩序地安放物品，举止谨慎，

“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相反的，“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如果用大人的“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体的礼貌”限制儿童，并要求他们跟随，“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他甚至将大人比喻为“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以此突显儿童的健全、活跃。

对儿童生活的赞扬，而批判大人生活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可见作者对大人生活的不满，而其心灵向往的是儿童的生活。这又可从《给我的孩子们》看出，他写道：“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列举出大人体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孩子们的“真率”“自然”“热情”，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给我的孩子们》一文里，丰子恺细致地描绘了孩子们的生活，他认为，他们的“做火车、做汽车、办酒、请菩萨、堆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这跟厨川白村所提出的观点根本相呼应——“人惟在游玩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人”。（厨川白村，2008：6）同时他又藉此批判大人们“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劳动的艺术化”的口号，比起孩子们创作的生活，只能说“出丑”和“愧死”。大人所说的“勤有功，戏无益”，在丰子恺看来，都是不健全的人格。他认为，人的心灵之广大自由，人创造创作的生活，唯有世间未被现实社会束缚的儿童才能真正体现出来。

这也看出了作者人生苦闷的内容，大人们不复有那样广大自由的心灵世界，不复有儿童般的创作力，因为大人们受了大自然的支配，受了人类社会的束缚，创作力和奔放自由的感情被压抑、被磨折。然而大人们都是经历过儿童阶段的，个个从自由的人儿变成了他心目中的“残废者”。而儿童即将成为大人的过渡，是丰子恺深深的苦闷根源。这种思想，可以从《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一文看出。

所谓的黄金时代，即是指儿童期。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作者所指的是送走一位健全的儿童，迎来一位社会成人。为此，作者深感悲喜交集。

所喜者，近年来你的态度行为的变化，都是你将由孩子变成成人的表示。我的辛苦和你母亲的劬劳似乎有了成绩，私心庆幸。所悲者，你的黄金时代快要度尽，现实渐渐暴露，你将停止你的美丽的梦，而开始生活的奋斗了，我们仿佛丧失了一个从小依傍在身边的孩子，而另得了一个新交的知友。“乐莫乐兮新相知”；然而旧日天真烂漫的阿宝，从此永远不得再见了！（丰一吟，2000：

120）

显然的，作者的悲多于喜。他回忆起阿宝曾是“家里的一个捣乱分子，每天为了要求的不满足而哭几场，挨母亲打几顿”，而且还是个“专门欺侮弱小的捣乱分子”。在作者看来，这都是人个性的表现，儿童的世界里只有奔放自由的感情，是撇除道德、善恶的价值的。然而渐渐长为成人的孩子，会开始牺牲自己的幸福来增殖弟妹们的幸福，会开始决意为父亲分担生活的辛苦。这对作者而言，都是感觉悲哀的事。丰子恺认为，孩子长大意味着开始懂得遏制自

己的要求，就算内心喊着想要也要压抑自己，这样的心理扭曲，丰子恺觉得特别苦闷，因为人间即将又少了一个幸福儿。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而阿宝的去处即将是充满人生苦闷的世间。这现实的世间，是迎来一个个退缩、顺从、妥协、屈服得像绵羊一般的成人。这是作者送阿宝出黄金时代而觉得悲哀的缘故，然而这是谁都必须经验的情形，作者的苦闷亦由此而生。

作者藉由赞美儿童世界批判大人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对大人社会的不满而生的苦闷后所予以的寄托。然而丰子恺心里明白，这种寄托最终会结束，因为孩子会长大成成人，即将渐渐地学会深深地压抑自己。因此，丰子恺的苦闷只能获得暂时的寄托，只能生暂时的“欢喜”，苦闷只有继续，不会结束。而且丰子恺为此苦闷的对象并不仅限于自己的儿女，而是大众的孩子，当时全中国的孩子们。因为在他看来，他所见的大人们是不健全的，孩子渐渐长大，意味着渐渐变得不健全，不健全的人们营造的自然是不健全的社会，想到这，怎能让他不忧心不苦闷呢？

第二节 人生无常的苦闷情结内容

丰子恺曾说：“欢喜读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书，欢喜谈与人生根本问题有关的话，可说是我的一种习性。”（丰一吟，2000：129-130）的确，他的散文作品里是不乏这类题材。而丰子恺所谓的人生根本问题，从他的散文里可总结出的不外乎是他对于时间、宇宙空间和生死的思考和疑惑。

丰子恺“从幼小时候就隐约地看见两个‘？’。但到了三十岁上方才明确地看见它们”。而这两个“？”，其实就是“空间”和“时间”。在《两个？》一文中，可见丰子恺年幼时已对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有了疑惑。只是年幼时虽有疑惑，但得不到答案时也就随着其他事情而暂且隐去了。年纪增长的当儿，这些疑惑并没有断却，反而令作者越发思考。然而思考得不出结果，疑惑终究未能解开，因而生了苦闷。作者得的空间概念是“宇宙是无穷大的”，然而无穷大的状态，又不能想象。作者对于宇宙空间无穷大的概念得不出所以然，只有深感疑惑而已。对于这疑惑，他曾认真问过他的朋友，然而朋友们不是笑他就是带点蔑视的眼神看他，由此可见他与世人的隔阂，亦足以构成他人生的苦闷。

丰子恺所思考和疑惑的第二个“？”是“时间”。他认为，时间的状态比宇宙空间“无穷大”的状态愈加使他不能想象。他指出时间的性状实比空间的性状愈加难于认识。他发现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可挽留，并且疑惑时间究竟怎样

开始？又将怎样告终？与空间之无穷大所得的疑惑一样，时间的问题得不出所以然并且与世人的隔阂是丰子恺人生苦闷的来源。作者对时间问题思考的另一篇文章，又可见《渐》。

作者以造物主骗人，人受“渐”的欺骗来表达愤慨苦闷。而这时间的问题，其实也正是作者感人生无常所生的苦闷。苦闷的原因是时间之无可把握，流逝之不留痕迹，人生于此渐渐地圆滑进行着。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丰一吟，2000：3）

因而笔者认为，人生无常的基础即在于时间的流逝。

作者深信宇宙间有一册大帐簿记录着他所有的疑惑和悲哀。他的疑惑和悲哀令他生了苦闷，还是因了时间的流逝，人生的无常。而在现实生活里，这样疑惑和悲哀的情感只有压抑而已，因为大众的感化和现实的压迫。而他尽管说以大众为师，然则看来只是更显讽刺意味。与世人没有情感共鸣以及他认为本应很重要的疑惑和悲哀的情感只有压抑的时候，人生的苦闷便应由而生。

从《陋巷》一文中，更可见丰子恺对人生无常而怀着的深深苦闷。因为母亲的逝世对他打击甚大，所以对待无常，起初的他是极度消极悲观的。

……可是另感到一种更深的苦痛：我那时初失母亲——从我孩提时兼了父职抚育我到成人，而我未曾有涓埃的报答的母亲。痛恨之极，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自己没有解除这悲和疑的能力，便堕入了颓唐的状态。我只想跟着孩子们到山巅水滨去 Picnic，以暂时忘却我的苦痛，而独怕听接触人生根本问题的话。我是明知故犯地堕落了。但我的堕落在我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颇能隐藏。（丰一吟，2000：57）

作者说的“我的堕落在我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颇能隐藏”，其实是在暗喻这世间的大众都是压抑情感，丧失广大自由心灵的人，过的是作者所谓的“虚伪”的生活。这岂不是狭隘又令人窒息的世界吗？想要有者为他解惑却苦等不着，这岂不是感情要求无法被应付的情况吗？显然的，苦闷情感深深地扎根于作者心中。

第三节 虚伪人事的苦闷情结内容

虚伪的人事社会，是遏制健全心灵的罪魁祸首，是人们不得不压抑真实情感的背景，因此这也是丰子恺人生苦闷的根源之一。《作客者言》是作者从第三者身份记录社会上的虚伪人事。

我脸上强装笑容——因为这正是“应该”笑的时候——心里却在叫苦。（丰一吟，2000：87）

我记念着屁股底下的东西，心中想皱眉头，然而不好意思用颦蹙之颜来听他的得意事件，只得强颜作笑。我感到这种笑很费力。硬把嘴巴两旁的筋肉吊起来，久后非常酸痛。须得乘个空隙用手将脸上的筋肉用力揉一揉，然后再装笑脸听他讲。（丰一吟，2000：87-88）

我心中很懊恼，但脸上只得强装笑容，连说“不要紧，没有什么”；其实是“有什么”的！我的新制的淡青灰哗叽长衫上又染上了芭蕉扇大的一块茶渍！（丰一吟，2000：89）

主人公心里的怨懣总是压抑着，以强颜作笑取代，这样一种所谓的礼貌、含蓄，是丰子恺批判的、不满的。此外，请人作客的主人总是要给予优礼的招待，一是灌酒，一是吃饭。然而主人请酒请饭，也不问作客者的意愿，就以为灌醉客人和不停地为客人添饭才是最有面子，最优质的待遇。然则其实作客者已把“胃吃坏，积滞了”，并且“隐隐地作痛”，而却只能“忍痛坐了一会，又勉强装了几次笑颜，才得告辞”。作者从文中带出了不管是作客者还是请客的主人，都是表面的礼貌客气，实则虚伪且不顾人的心底意愿、一味儿地压抑真实情感罢了。

在《画鬼》里，作者写道：

我在小时候，觉得青面獠牙的凶鬼脸最为可怕。长大后，所感就不同，觉得白而大而平的笑鬼脸比青面獠牙的凶鬼更加可怕。因为凶鬼脸是率直的，犹可当也；笑鬼脸是阴险的，令人莫可猜测，天下之可怕无过于此！我在小时候，看见零零碎碎地表出在万人的脸孔上的鬼相，凶鬼相居多，笑鬼相居少。长大后，以至现在，所见不同，凶鬼相居少，而笑鬼相居多了。因此我觉得我在所见的世间比儿时所见的世间更加可怕。（丰一吟，2000：167-168）

由此可见成人世界的虚伪、可怕、阴险。

第五章 结论

五四时期里，知识分子似乎都有一股忧愁，愁国家、愁民族、愁社会、愁人生，无尽的苦闷也应由而生。丰子恺当然也脱离不了这时代的忧愁气质，同样感到无尽的苦闷，不然也不会热心翻译起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了。丰子恺苦闷的具体内容经过层层分析，当可作个总结了。

文章题材多围绕在儿童，是因为儿童的世界、儿童的心灵、儿童的游戏，是自由的、广大的、真实的。丰子恺对此表示赞美与向往，是因为大人世界的虚伪和扭曲令他苦闷懊恼又无奈，儿童是他广大自由的心灵的寄托。成人都是经历过儿童阶段的，而儿童所拥有的自由、广大和真实，都是成人曾经拥有的，不过随着岁月渐渐地深深压抑在心底而已。他的苦闷是大人们都忘却了这点，却在大人世界的虚伪和扭曲泥足深陷。在他看来，那是最不健全的人类，他们又何以建造健全的社会？人生无常和虚伪的人事社会，在他看来，都是人们应去认真看待的事情，然而人们往往不屑一顾、不愿提起，不过盲目地活着而已。

由这些题材可见，丰子恺所生的苦闷除了是个人所感，也是本着对普罗大众的一种关怀，一种对人性的关怀。薛雅明曾对此为丰子恺定下了有佛家的慈悲情怀，在他看来，丰子恺的艺术创作也因而总是有一份平和、恬静和飘逸，不像厨川氏的热烈激情又让人亢奋，他认为正是这样的文艺思想观超越了厨川

白村。（薛雅明，2008：35）虽则笔者亦喜欢丰子恺作品中的那份平和、恬静和飘逸，然而并不会将之定义为超越。因为那是时代背景、社会背景、人生经历与人格修养的不同，这样的比较失之偏颇。

反之，笔者欲紧扣主题补上最后一些话，其实“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这一观点，除了创作者是重点，鉴赏者亦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不管是丰子恺散文中的苦闷情结，还是厨川白村的象征性著作，若没有读者产生共感，笔者认为都是不健全的一环。厨川白村一定是做到了健全的一环，因为鲁迅读懂了他，丰子恺也读懂了他。而笔者在研究丰子恺散文的苦闷情结之际，亦从中为自己解了惑得到启发。人生不免充满苦闷，而只有不盲从因袭、传统的人尤其感觉强烈。丰子恺通过艺术与宗教获得暂时的解脱，笔者亦希望以此为鉴，获得“生的欢喜”。

参考书目

一 专书

1. 厨川白村（2008），《苦闷的象征》（鲁迅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 丰华瞻、戚志蓉编（1985），《丰子恺论艺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3. 丰一吟选编（2000），《丰子恺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4. 丰子恺（2005），《丰子恺美术讲堂》，台北：三言社。
5. 丰子恺著，丰陈宝、杨子耘编（2004），《丰子恺随笔精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 [挪威] 何莫邪（2005），《丰子恺——一个有菩萨心肠的现实主义者》（张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7. 石晓枫（2007），《白马湖畔的辉光——丰子恺散文研究》，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 杨牧编（1982），《丰子恺文选》，四册，台北：洪范书店有限公司。
9. 余连祥（2005），《丰子恺的审美世界》，上海：学林出版社。
10. 钟桂松（2003），《人物聚焦丛书·丰子恺》，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二 学位论文

1. 薛雅明（2008），《丰子恺与厨川白村文艺思想比较研究》，硕士论文，华侨大学，泉州。
2. 赵晓燕（2005），《丰子恺散文论》，硕士论文，苏州大学，苏州。

三 期刊论文

1. 郝江波、赵蕾（2007），〈出世情怀入世心——丰子恺早期散文创作中的现实关注〉，《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页48-49。
2. 孙希娟（1999），〈丰子恺散文创作简论〉，《兰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页191-196。
3. 薛雅明（2013），〈“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丰子恺与厨川白村文艺观之比较〉，《华侨大学学报》，2013年第二期，页95-100。
4. 余连祥（2006），〈绝缘·苦闷·情趣——丰子恺美学思想的特征〉，《文学评论》，2006年第4期，页190-194。